

# 權力、視域與台江海面的交疊

## ——清代台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詩作中的人地感興\*

李知灝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摘要

台灣四面環海，尤其對清代游宦人士而言，海洋更是台灣在地理上的特色。綜觀整個清領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海洋書寫，多有藉登臨游泛的機會描寫觀海或泛海時的感懷者。當中讓人關注的是，清代府城地區官紳「登臺觀海」，將海洋相關景物與權力場域的變化結合，藉可「見」之景抒發「不見」之情，進而成為台灣古典詩中相當特殊的區塊。

清領前期，天下初定，海洋的澄澈成為來台官員一展「澄清」之志的象徵，希望能讓台灣這塊新開拓的海疆得以和平安樂。而府城官紳感受權力場域的氛圍，藉登台之機，讚頌盛世昇平，機表達自身對權力核心的信任與效忠。

然而當局勢穩固，統一天下的欣喜隨著時間消退，海洋成為個人在宦海中浮沉的寄託。游宦文人「登臺觀海」，一方面感嘆海洋造成他們與帝國權力中心的隔閡，一方面海洋卻也是朝向帝國權力中心的唯一途徑。因此清領中期「登臺觀海」詩作中的海洋，普遍夾雜了「遇／不遇」的複雜情感。

至於清領後期內亂、外患頻傳，濱海的府城自是嚴陣以待。此時府城地區官紳「登臺觀海」所見之海洋就充滿了威脅，詩作中更是屢屢浮現危機的隱喻。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之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更加堅實。筆者勉力改正，惜有未週之處，仍待筆者再行思考，以深化論述。

因此，清代官紳對於台江近海之描述，並非單純書寫海洋之自然樣貌，當中更有相當複雜的人文社會之隱喻。尤以登臺觀海之作，因其與權力核心有所連結，雖然描寫的海洋面向不盡相同，或懷古、或歌頌、或焦慮、或愁思，但其書寫之根源皆來自權力場域的影響。這也使得清領時期的台江海面，呈現出豐富的人文意義。

關鍵詞：八景詩、澄臺、赤崁城、台灣古典詩、海洋文學、自然書寫



# The Ch'ing Dynasty Imperialist Eye of Maritime Space in Taiwan: China Officers' Han Poetry in Tai-Chiang Area

Li, Chi-Ho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Ocean is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aiwan, especially for the Ch'ing dynasty officers from mainland. These china Officers often Step on watchtowers in Tainan , overlook the Tai-Chiang maritime space, and create Han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This act is characteristic in Taiwa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s analyzing these Han poetry and the china Officers mean on Watchtowers.

In the Ch'ing dynasty earlier period, "Clear" is a badge for the power field. It's meant the Ch'ing dynasty eliminate the southern Min dynasty in Taiwan and unite whole China. When the china officers on watchtowers overlook the Tai-Chiang, they also celebrate the "Clear" ocean in Han poetry to express they are loyal to the power center.

In the later period, Ch'ing dynasty confront the civil strife and foreign aggression. When the china officers on watchtowers overlook the Tai-Chiang, the ocean in Han poetry is turbulence.

Therefore, the ocean in China Officers' Han poetry is not only "Nature", but also compared to the power field.

Key words: Eight View in Taiwan, Taiwan Han Poetry, Ocean Literature, Nature Writing, Taiwan Literature

# 權力、視域與台江海面的交疊

——清代台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詩作中的人地感興

## 一、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尤其對清代游宦人士而言，海洋更是台灣在地理上的特色。海洋，是區隔「中原」與「殊方」的界線，甚而從中國大陸啟航遠離陸地，進入台灣海峽之後，海峽本身就視為是「殊方」之範疇，也是游宦人士對「台灣」最早的印象。正如台灣最早的方志，高拱乾《臺灣府志·凡例》中所說：

山川、形勝，所以設險固圉，亦以領異標奇，……臺灣為新闢，海疆流峙，異於中原；雖詞客騷人，未多登臨游泛之作。而扞衛四省，屹立大洋；筆之予書，匪特觀美，故於海道三致意焉。<sup>1</sup>

由「海疆流峙，異於中原」之語可知，台灣之山川形勝又以海洋最具特色，故而在方志的編纂上對海洋多有著墨。雖然在高拱乾編纂《臺灣府志》之時，「詞客騷人，未多登臨游泛之作」，然而綜觀整個清領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海洋書寫，多有藉登臨游泛之機會描寫觀海或泛海時的感懷者。例如在渡海來台之際，對於海上的諸多現象，都以神怪傳說加以比附，藉此展現自身之驚嘆或志氣。或者在岸邊描述近海的海洋活動，如「八景詩」中的「安平晚渡」、「沙崑漁火」、「鹿耳春潮」、「鹿耳連帆」、「鯤身集網」等作，就描寫台江近

1 高拱乾，《臺灣府志（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序頁17。又見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序頁9。

海的活動。<sup>2</sup>而當中讓人關注的是，除單純描述近海活動之外，登上建築物觀看海洋，更是清代府城<sup>3</sup>地區古典詩書寫的特色。

登高望遠，本非奇特。然台灣各處之觀海詩多以登山為主，如林紹裕〈重九後一日登鼓山觀海〉、吳德功〈肚山觀海〉、楊浚〈香山觀海〉等等，皆登山觀海所作。然而，府城地區觀海書寫卻非登山而作，一則府城地區多為平地，未有近海之崇山峻嶺；其次，若觀察當時詩作中所登覽之建物，亦可從中看出端倪。從現有詩作中可發現，官紳多以「澄臺」或「赤嵌（崁）城」作為登高望遠之處，故而有「澄臺觀海」等作。「澄臺」乃位於道署之內，「赤

2 針對臺灣古典詩作中海洋書寫之相關研究，近年日益蓬勃，在專書、期刊論文方面，舉其大要，有：

- (1) 陳啟佑，〈臺灣海洋詩初探〉，《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1999.09）
- (2) 陳思穎，〈來自大海的呼喚——論清初巡臺御史錢琦詩作中的海洋書寫〉，《國文學報》6期（2007.06）
- (3)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03）
- (4)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5期（2008.06）
- (5) 陳懷汎，〈清代方志對澎湖景觀的書寫——以傳統漢詩為研究對象〉（上、中、下），《碇砧石》55、56、57期（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09.06、09、12）

相關學位論文則有：

- (1)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到清朝時期〉（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5）
- (2)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官遊詩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 (3)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8）

在2009年10月24日在中山大學舉辦之「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亦有3篇相關論文發表：

- (1)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官遊詩人對海洋的審美感知與空間體驗〉
- (2) 陳家煌，〈康熙時期台灣詩中的海洋感受——以《赤嵌集》為討論中心〉
- (3) 李知灝，〈蛟鯨宮闕龍伯國：清代游宦文人渡臺書寫中的海洋想像〉

而與本文所論述之「登台觀海」詩作較為相關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文獻，則有：

- (1)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06.06）
- (2)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04）
- (3) 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臺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國文學報》5期（2006.12）

3 本文之「府城」專指台南地區之「府城」。雖在光緒5年（1879）另外成立台北府，並建有城池，但在台灣日常用語中，「府城」即指台南，故本文沿用之。

嵌（崁）城」無論是指今日之赤崁樓或安平古堡，<sup>4</sup>在當時也都是軍事要地，皆非一般人所能登覽。<sup>5</sup>再加上光緒5年（1879）台北府成立之前，台南是台灣地區唯一的「府城」。換言之，從康熙22年（1683）清廷攻佔台灣之後，台南府城延續明鄭「東寧」王都的傳統，長期位居台灣權力核心。而「澄臺」或「赤嵌（崁）城」位於當時台灣軍、政的權力核心之地，非有特殊之身分無法登覽。可登覽者，為清廷駐台之官員或間雜具有功名之台灣士紳。台南府城作為清代台灣權力核心近兩百年中，官紳「登臺觀海」所累積的海洋書寫更足以觀察其書寫的演變，自然也成為台灣古典文學中相當特殊的區塊。

然而，「登臺觀海」這種觀覽自然景致的書寫，何以能產生與權力場域有關之意義呢？除了建築物本身的權力意義、作者身份的權力象徵之外，在古典文學中，與亭臺樓閣相關書寫所形成的文學傳統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中，就提到這些人工建築對於詩人的影響：

「山水」美感，常常會因亭、臺、樓、閣的人文素質，或者是其地理位置，或者是其歷史記憶，再加上聚會的場合，登臨的處境，使得這種「山水」美感，只成為進一步生命省察的基礎。<sup>6</sup>

文中所舉出的「人文素質」、「地理位置」、「歷史記憶」、「聚會場合」及「登臨處境」，讓登臺觀海有著深層的文學內涵。在「人文素質」方面，登臺觀覽在書寫自然的作品中，「見」與「不見」的情景交融乃其行為所造成的特

4 「赤崁城」或作「赤嵌城」，如《臺灣府志·規制志》云：「赤嵌城，在府治西北隅。周圍廣四十五丈三尺、高約三丈六尺餘。無雉堞之設，名雖為城，其實樓臺而已；故又名紅毛樓。紅毛酋長居之。鄭氏因以貯火藥軍械，今仍之。」高拱乾《臺灣府志·（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頁28。此處指今日之「赤崁樓」。又如《重修臺灣府志·雜記》云：「赤嵌樓：在鎮北坊，荷蘭所築也。又名紅毛樓。」又云：「紅毛城：在安平鎮。亦名安平城，又名赤嵌城。」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六）》（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頁539。此處將今日之安平古堡稱為「赤崁城」。可見在清領時期，「赤崁城」之定位或有混淆。

5 其他地區如「彰化八景」中的「定寨觀洋」或「蘭陽八景」中的「北關海濤」，亦是登臨軍事要地之作。可見清領時期台灣詩人「登臺觀海」，實有其特殊意義。

6 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1），頁282-283。

性。「登臺」之舉，讓人得以見他人所不能見，以不同的角度、更廣大的視野來書寫自然景物。但另一方面，「登臺」也代表詩人所能見之景致早已在築臺之時被限定。當他站在固定的地點，最大視域也被侷限。不同於動態的遊山範水，可以轉換視角進行書寫。詩人在登臺觀覽，收得周遭景致的同時，亦自覺其極限而知有「不見」之域，更挑起詩人探索「不見」之域的欲望。王之渙〈登鶴鵲樓〉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語，正是描述此種欲求。因此，登臺觀覽的書寫就在可見之景與「不見」之情中產生。

在「地理位置」方面，如前所述，對於清廷的游宦文人來說，「海」是台灣的特徵，故而登臺觀海成為來台官員對台灣的認識基礎。但是在書寫所見的同時，必然不只是單純描繪海上景象，必受其他因素之影響而夾雜著人文的想像，這正是詩人探索的「不見」之域。例如在「歷史記憶」上，台灣在清廷領台之前，曾受過荷蘭、西班牙及明鄭的統治。荷蘭、西班牙都是來自海洋的威脅，明鄭更是經過海洋與清廷對抗，最終清廷以海上武力消滅明鄭、攻取台灣。對於來台的清廷官員來說，這段與自身權力場域對抗的歷史記憶，必然透過「登臺觀海」的舉動進入書寫當中。

至於「聚會場合」及「登臨處境」方面，亦在「登臺觀海」的行動中有所作用。當府城官紳站立在權力中心之地，或獨自登眺、或聚會宴飲，<sup>7</sup>自然更進一步將視角集中在自身與權力場域的關係或權力場域所關注之處，這同樣也是詩人探索的「不見」之域。由此可知，「不見」之情並未與所「見」之景脫節，自然的場景在登覽賦詩的行為中與人文之情相互融合。所以在柯氏該文中亦提到：

〈登樓賦〉在「遊觀」文學中的重要啟示，可能就在於「登覽」的活動，並不僅只「放意肆志焉」的「暢神而以」；在我們「登高」之際，我們更可能「睹物興情」，由所「見」而及於「不見」，自「觀

7 中國古代文人之登臺，或因宴飲聚會，多有例證，如《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所云：「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而府城地區官紳雲集，藉宴飲之機，登臺賦詩，則相當自然。

看」而引生「想像」，獲致的不僅是山水景物的美感經驗，更可以切入歷史、社會、時局，以至個人的遭遇，成為達到自我生命情境，也就是「命運」，之突然醒覺的階梯。<sup>8</sup>

所以透過「登臺觀海」，可獲致的並不只是單純的自然景物，更是與歷史、時勢、個人境遇相結合。<sup>9</sup> 這樣「登臺觀海」之作，或與當代「自然書寫」的定義不盡相符，<sup>10</sup> 然而可以做為當代自然書寫之「前史」，<sup>11</sup> 作為當代自然書寫之對照。

綜合前面所述，探析府城地區官紳「登臺觀海」之作，必與權力場域有關。無論是清廷駐台官員還是台灣本地士紳，都是科舉階層，也就是當時權力場域的一份子。如前所述，無論是「澄臺」或「赤嵌（崁）城」都帶有權力核心的色彩，「登臺」的行為本身，就具有身份上的自我歸屬。作為清帝國權力場域中的一員，對於場域的變化是否藉由「觀海」之機來展現？不同時期「登臺觀海」的書寫樣貌，是否呈現出些微的差異？<sup>12</sup> 身處台灣權力核心（至少在權力結構之中）的府城官紳，是如何看待海洋？海洋哪些特質成為詩人感興、比附的對象？此時的海洋已非單純的自然景觀，定與權力場域中的變化有關，或平穩、或興濤，進而影響到詩作中的海洋意象，這即是本文所要探討者。

8 同註6。

9 如陳啟佑〈臺灣海洋詩初探〉一文中，也嘗試以「視角」、「主題」論述台灣古典詩中的觀海書寫。在「視角」中，分析站在台灣北、中、南、東部，以及澎湖、渡海船隻中觀看海洋有何不同。並分別釐析出「無線」、「渺小」、「虛無」、「動盪」、「戰爭」、「國仇」、「鄉愁」、「興亡」等8個主題。當中可見自然景致之狀態與人文社會交雜的情況。陳啟佑，〈臺灣海洋詩初探〉，《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

10 台灣當代的「自然書寫」多借文學書寫表達對環保議題、環境倫理的關注。相關論述可參見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當代自然書寫的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11）。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臺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37卷2期（2007.12），頁491-533。

11 吳明益，〈對話的歷程：臺灣散文體自然導向文學的演化概述〉，陳大為、鍾怡雯主編，《20世紀臺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09），頁164-165。

12 本文對台灣清領時期的分期，粗略以康熙、雍正時期為「清領初期」（1683-1735）；乾隆、嘉慶時期為「清領中期」（1736-1820）；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為「清領後期」（1821-1894）。

## 二、鯤海澄清：清領初期海疆拓土之同歡

康熙22年（1683）施琅攻台，翌年清廷決定將台灣收入版圖，設官治理，自此開啟了近兩百年的清領時期。在清領初期，明鄭遺臣之能人志士多被遣送回中國大陸分散安置，可賦詩能文者鮮少。再加上印刷不易，所能傳者更如鳳毛麟角。因此，目前所能見之文獻，絕大多數為清廷派遣來台之官員。而在府城地區官紳「登臺觀海」詩作中，康熙31年（1692）任分巡台廈兵備道的高拱乾實為鼻祖。<sup>13</sup>其建築之「澄臺」，即造就了「台灣八景」中的「澄臺觀海」，成為後世詩人書寫「台灣八景詩」時登眺之所。高拱乾興建「澄臺」之原因，見其〈澄臺記〉所言：

臺灣之名，豈以山橫海嶠，望之若臺；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然厥土斥鹵，草昧初闢，監司聽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安息之所，耳目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并所謂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峰光，亦無由見。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之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sup>14</sup>

此文之開端，先將「台灣」之名加以引伸詮釋，認為台灣之所以被稱為台灣，有海山如「臺」、官民居「灣」之意，試圖以漢文化的文字體系來理解台灣。但因為官民居處狹小，既到臺灣卻無以遍觀「臺」、「灣」，故築亭臺以見。然而，在道署這樣的官方建築中興建亭臺，又豈止是單純希望有一個閒暇時能登眺的處所？清廷來臺官員身負治理之責，更何況是位居當時台灣權力核心的分巡台廈兵備道，所有官僚皆受其指揮，其言行舉止自然要成為官民之表率。所以在〈澄臺記〉的後段繼續說：

13 雖然在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臺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一文中，認為高拱乾與同時之王善宗、齊體物同為「臺灣八景詩」之始祖。然以當時三人之官階，當為高拱乾所主導。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臺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國文學報》5期（2006.12）

14 高拱乾，《臺灣府志·（四）》，頁262。

惟天子德威遐被，重譯入貢，薄海內外臣民共享清晏之福。而余振綱飭紀，分揚清澈濁之任焉；正己勵俗，有端本澄源之責焉。<sup>15</sup>

所以「澄臺」之所以命名為「澄」，除了有藉登覽來排憂解悶、一「澄」心志之意義外，更帶有站在清帝國的立場，一同慶賀在海疆拓土，使台灣大治的喜悅。期許來台官員為王朝治理台灣地區，藉「澄清」民俗，來為大清盛世效忠盡力。<sup>16</sup>故此，蕭瓊瑞在《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中，就描述高拱乾因應這時期清帝國權力場域的氛圍，所設定的「台灣八景」：

在大清帝國天下抵定的樂觀情緒鼓動下，高拱乾等人選定的台灣八景，也就充滿了一種激昂奮發的意象與平和富足的理想，同時又不忘藉著八景的設定，圈定臺灣疆域的版圖範疇。……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大八景的選定，基本上以府治，甚至可以說是以高氏本人辦公的「府（道）署」<sup>17</sup>為中心，輻射出去。<sup>18</sup>

書中比較中國傳統的「瀟湘八景」與高拱乾選定的「台灣八景」，認為高拱乾在當時權力場域歡樂氛圍的情況下，所選擇的「八景」也充滿了奮發向上的正面想像，與「瀟湘八景」偏於憂傷之情調迥異。在八景之中，位於「道署」中的「澄臺」與「斐亭」，明顯帶有權力核心之意味。

高拱乾在「台灣八景」中所選定的「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也有不同於其他六景的意涵，甚至「斐亭」、「澄臺」兩者之間所象徵的意義亦有所不同。「斐亭」乃為「對客之地」，象徵以較對等的姿態來廣聽民意。而「澄臺」乃為「覺滄渤島嶼之勝」，故以較高之姿態俯視群倫。由是可知「澄臺」

15 同註14。

16 正如吳毓琪在〈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中所說：「表明一己為家國功業犧牲之志，知識份子對家國的忠心，同時也運作權力空間化的意識，來建造人文亭臺，擬塑台灣成為文治化的社會，使台灣的原始素樸空間逐漸被中原文治社會所取代。」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博論，2006〉，頁225-226。又見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臺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國文學報》5期，頁52。

17 此處蕭氏書中稱「府署」，然應為「道署」。

18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2006），頁256。

這座位於權力核心的高臺何以能成為「台灣八景」的壓軸，乃寄託站在權力中心的身分來觀看台灣這塊新疆土的隱喻。所以高拱乾在澄臺落成之後，其〈澄臺觀海〉一詩中，就顯現出這種觀覽姿態，並寄託權力場域對臺灣未來的期盼。其詩云：

有懷同海闊，無事得臺高。瓜憶安期棗，山驅太白鰲。鴻濛歸紫貝，  
腥穢滌紅毛。濟涉平生意，何辭舟楫勞。<sup>19</sup>

詩中描述高拱乾希望能登臺觀海，因而與僚屬一同登覽。<sup>20</sup>又因為台灣承平無事，故官員們得有閒暇登上澄臺。此時，似於澄臺之上宴飲中，看見台灣碩大的瓜果而聯想到秦漢時期安期生植棗如瓜的故事。台灣本身，彷彿就是被太白金星一劍斬下的鰲魚頭所幻化而成。高拱乾援用古代的神話傳說，將台灣想像為海中鰲魚之首級，頸聯「鴻濛歸紫貝，腥穢滌紅毛」之語，實為「歸紫貝鴻濛，滌紅毛腥穢」之倒裝。表示來到台灣，就好像回到上古神話的場景一般，充滿了海族龍宮的自然氣息。然而，相較於漢文化中的海洋神話，台灣卻仍充滿著異族的文化，此即荷蘭以來所帶來的「殊方」氣息。登上澄臺向西望海，即可看見荷蘭人留下的赤崁城仍然屹立海濱，這樣的景致就觸動了詩人的報國情懷。因此，詩末「濟涉平生意，何辭舟楫勞」之語，述說他不辭辛勞的渡過海峽來到台灣，背後有一個目的，這同時也是他平生的志向。這個目的為何？其實就是頸聯對句所說的，要將「紅毛」遺留下的之「腥穢」加以洗滌。換言之，此即游宦文人將生平志向與帝國一統之大業相結合，去除台灣「殊方」之氣息，敷以漢文化，完成他在《臺灣府誌·序》之開端所宣稱的「天下車書大一統」。<sup>21</sup>

除了高拱乾之外，與其同時在台為官者也有〈澄臺觀海〉之作。這並非偶然的巧合。依古代文人之習性，或為高拱乾於澄臺落成後，邀集僚屬登臨賦

19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02），頁207。

20 高拱乾與同時之官員王善宗、齊體物等人皆有〈澄臺觀海〉之作，應為一同宴飲而成。

21 高拱乾，《臺灣府志》·（四）》，序頁3。

詩所作。如王善宗，山東諸城人。康熙29年（1690）來台，擔任台灣水師協左營守備之職。他亦有〈澄臺觀海〉一作，在詩中同樣寄託對王朝取得台灣這塊新疆土，並加以妥善治理的意圖。其詩云：

巍峨臺榭築邊城，碧海波流水有聲。濟濟登臨供嘯傲，滄浪喜見一澄清。<sup>22</sup>

詩中敘述在台灣這塊新開拓的邊疆築起高臺，眺望海濱。和「濟濟」的才俊之士一同登臨澄臺，作詩唱和，更是凸顯平定台灣這塊海上疆土，使其才盡為朝廷所用，最終讓台灣這塊海上疆土得以大治。<sup>23</sup> 同時期創作〈澄臺觀海〉者，還有齊體物。齊體物，漢軍正黃旗人。康熙30年（1691）由漳州海防同知調任台灣府海防捕盜同知。其詩云：

臺因觀海構，遠水綠於蘿。浩渺心俱闊，澄清志若何。只疑天是小，更覺地無多。白雉梯航路，於今尚不波。<sup>24</sup>

登上澄臺觀海，內心像海洋一般開闊，而希望能安定台灣的意志超越天際，更遠大於這塊海上的新疆土而涵蓋之。詩末「白雉」之典故，出自《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sup>25</sup> 而整個漢代，亦多見外邦向中國進貢白雉的紀錄。如《漢書·平帝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sup>26</sup>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

22 同註19，頁190。

23 正如廖肇亨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針對王善宗此作之評述時說：「如今海氛已靖，天子聖明，武功與文治皆名垂千古。總兵官詩格如此，可以想見其為人，緣於今人不識面目，徒因其組詩之名而喜為稱之，固忘其真意也。事實上，王善宗〈臺灣八景〉此組詩作與其後寫景為主的同名組詩不同，是時此組作品仍然滿含明清之際的政治寓意，不能徒以單純寫景之作視之。」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頁64。

24 同註19，頁194。

25 《後漢書》（四庫全書253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652。

26 《漢書》（四庫全書249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77。

雉。」<sup>27</sup>可見「白雉」不只是祥瑞之徵，更代表著中國南方的邊疆地區向中原王朝的效忠。而全詩之意旨，就如同高拱乾、王善宗一樣，希望能以一己之力，讓台灣這塊海上新域永遠向清帝國效忠。詩末所稱之「梯航路」，乃形容台灣海峽的驚險航程，又象徵台海的情勢，而在官員的治理下平靜無波。齊體物或也藉此稱頌長官（高拱乾）、自己與僚屬（王善宗或其他官員）的治理功績。由此也可看出，清領初期權力場域對於帝國拓土的欣喜氛圍，以致於來台官員透過「登臺觀海」以賦詩，表達自己對治理台灣之重視。

在高拱乾、王善宗、齊體物之後，清領初期接替來台的官員，在其「登臺觀海」詩作中，亦有表現出此種意念者。如婁廣，京衛人，康熙44年（1705）任分巡台廈道標守備。其〈澄臺觀海〉之作云：

海國淼無窮，澄臺瞰四封。自從歸禹貢，何水不朝宗。<sup>28</sup>

登上澄臺觀海，彷彿可以看見全台各處，這其實就是「澄臺」權力核心的位置，讓詩人產生此處為台灣中心的想像。詩末讚嘆自從攻取台灣、納入版圖之後，所有的水域都效忠朝廷，就像眼前的這片海洋一般。由此可見，延續了高拱乾、王善宗、齊體物等人的書寫路線，婁廣藉由「登臺觀海」之機，站在權力核心的「澄臺」，歌頌著清帝國海疆拓土的功績。

除了「澄臺」之外，當時府城地區還有兩座赤崁城（樓），即今日的安平古堡與赤崁樓，也是文人登眺的景點。或因為這兩個地點曾經是荷蘭與明鄭的統治中心，故未被高拱乾選入「台灣八景」之中。然而，作為過去的權力中心，詩人在登眺的同時，也不禁有所感嘆。如林鳳飛<sup>29</sup>〈登紅毛城詩〉詩中「堪笑霸圖歸幻夢，獨留遺跡弔寒暄」<sup>30</sup>之語，就感嘆歷史演變中台灣政權的轉移。但也有詩人在書寫中，藉政權轉移的歷史記憶，凸顯自己為清帝國效

27 同註25，頁86。

28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頁365。

29 林鳳飛，康熙年間福建福州人，其餘生平未詳。

30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二）》（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02），頁49。

忠，並治理這塊新疆土的意志。如宋永清，山東萊陽人，康熙43年（1704）以漢軍正紅旗監生任鳳山知縣。其〈赤嵌城〉詩云：

城俯汪洋島嶼孤，週遭樓閣倚菰蒲。一番風雨醒殘夢，萬頃波濤冷壯圖。戍卒戈船蟠地利，桑麻雞犬附天都。閭閻近已敷文教，不是殊方舊楷模。<sup>31</sup>

登上赤嵌城眺望大海，感覺自身就位居海中島嶼一般，<sup>32</sup> 周遭的市鎮彷彿就依偎在水草邊。頷聯之語，表面上描寫登臺觀海所見，但實際上影射著明鄭王朝的覆滅。經過如狂風暴雨般的征戰，讓殘留在台灣，明末遺民的反清大夢徹底清醒。清廷的軍隊就像這巨大的波濤一樣，瓦解了明鄭雄據一方的計畫。如此，詩意方能與後面的頸聯相連貫。頸聯陳述，如今清廷的水師、步卒到台灣這裡開闢新的疆土，更讓台灣繁榮得像仙境一般。最終更稱讚官方在教化民眾上的用心，將過去明鄭、乃至於荷蘭時期留下的規制掃除，將台灣從「殊方」徹底納入中原文化的體系之中。

由此可見，清領初期來台官員因權力場域中的氛圍，其「登臺觀海」所聯想者，多為帝國能在海疆拓土感到歡欣。最後落實到書寫上，就如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人對海洋的審美感知與空間體驗〉一文中所說：

仕宦者書寫海景時，其心中情思來源，一方面得自賞心悅目的海景，觸動了作者敏銳的心靈，使作者對自然的海洋景觀，領受了超越現實利害的審美樂趣；另一方面橫互於作者眼前偉大的海疆，此廣袤的空間形式與政治拓展的功利企圖相連結，以象徵康熙王朝豐偉之功業。<sup>33</sup>

詩人透過可「見」之海洋景觀，聯想到一般人所「不見」之權力場域的氛圍，海洋的「澄清」，就象徵著帝國運勢之「澄清」。在「見」與「不見」之情景

31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頁353。

32 可見其登臨之赤嵌城，應為鯤身沙洲上的安平古堡。

33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人對海洋的審美感知與空間體驗〉，「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2009.10.24）。

交融之中，表現出對未來充滿積極奮發的想像，完全不見一絲陰鬱。不只為帝國能統一天下感到歡欣，更在書寫中表達願意為帝國盡忠，努力治理這塊新疆土，延續此太平盛世。

除來台的游宦人士之外，康熙年間台灣籍<sup>34</sup>的士紳也有「登臺觀海」之作，同樣也表達對清帝國海疆拓土的欣喜與台灣在清廷治理下的安定氣氛。這些地方士紳多為官方儒學生員或貢生，雖未考取舉人、進士而榮登青雲，然清廷給予這些生員某些特權。如：可免丁糧、雜差，見地方官可站立回話，並可主持某些地方自治事務。這也讓這些士紳在地方上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見地方官可站立回話，使其有更多機會與官員接觸；主持地方自治事務，如團練、慈善事業等等，更是增加士紳與官員的互動更加密切。因此這些台灣地方士紳或致力於科舉，或參與地方事務，都無可避免的向權力核心靠攏。以致於在「登臺觀海」書寫中，呈現出與游宦人士相似的樣貌。如黃名臣，原籍福建晉江，康熙年間臺灣縣學廩生，也有〈登紅毛城〉詩云：

雄鎮當年控上游，波濤萬頃望中收。鯤身雲合晴皆雨，鹿耳風生夏亦秋。潮汐時通滄海氣，乾坤中劃大江流。從茲島嶼風煙靜，極目縱橫盡釣舟。<sup>35</sup>

登上紅毛城觀看台江海域，回想過去，這裡曾是荷蘭、明鄭的軍事要地。如今收歸清廷版圖，正值太平盛世，海面上都是漁船，充滿了安樂繁榮的景象。同樣藉「登臺觀海」描述台灣安樂景象者，還有陳聖彪。陳聖彪，台灣縣人，康熙47年（1708）副貢，其〈赤嵌城觀海〉就說：

孤城獨上俯瀛洲，極目蒼茫一望收。落日半痕天共白，晚潮千頃月同流。滄溟隱入蛟龍窟，島嶼寒生海市樓。波浪不揚征戰息，舳艫閒作

34 當時由於台灣本土有志於科舉者較少，或有「冒籍」之情況。然而「冒籍」與否，今日已難考據，故本文據方志文獻指稱為臺籍者，即認定為台灣士紳。

35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二）》，頁80。

釣魚舟。<sup>36</sup>

詩人都是藉由「登臺觀海」，表面上描述台江海域充滿了和平安樂的氣氛，實則藉此歌頌清廷之統治。其他又如李欽文，台灣府治東安坊人。康熙60年（1721）歲貢生，曾任福建南靖訓導。後擔任分訂《重修臺灣府志》之職，並分修諸羅、鳳山、台灣三縣志。其〈登紅毛城〉一詩，藉景表達自己對清帝國的效忠。其詩云：

高築堅城自昔時，登臨遠眺快襟期。潮聲暗逐風聲急，鴈影還隨日影遲。鹿耳浮沉天以外，鯤身隱現水之湄。於今休問當年事，總為王朝壯帝基。<sup>37</sup>

詩人登上「紅毛城」，此處應為今日之赤崁樓，<sup>38</sup>眺望台江水域。看見海面上浪潮之流動，水鳥之悠閒，而鹿耳門與鯤身就在台江水域遙遠的另一端。但鹿耳門、鯤身又豈在海角天邊？實則詩人運用空間上的誇飾，來比擬時間上的遙遠，陳述明鄭王朝的事蹟已然久遠，如此方能連接尾聯之「於今休問當年事」。無論過去的「紅毛城」是如何抵抗清廷，如今已成為保衛王朝的堡壘。詩人表明自己站在紅毛城上觀海並不是要憑弔明鄭王朝，而是透過對海面上的活動與歷史記憶之描述，展現自己與「王朝」站在同一陣線，成為帝國的基石奉獻心力。

綜觀清領初期府城官紳「登臺觀海」之作，就可發現其中充滿了對帝國開拓台灣這塊海濱疆土的喜悅，藉由慶賀王朝開拓海疆新域，實則表現對王朝的忠誠。此舉或順應當時權力場域的氛圍，用以取得科舉階層的認同。另一方面，這些詩作中的海洋景致都充滿了光明、樂觀的景象，實則是府城官紳藉海洋隱喻帝國的運勢之「澄清」，期待帝國有美好的未來。由此可見，清領初期

36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頁375。

37 同註35，頁39。

38 此處之「紅毛城」應指今日之赤崁樓，因為登臺遠眺，鹿耳跟鯤身都在海中浮沉，故可知詩人身處赤崁樓向西登眺。

攻取台灣，完成天下一統的興奮，著實影響著「登臺觀海」詩作中的海洋形象。

### 三、宦海浮沉：清領中期天涯羈旅之抒懷

在清廷將台灣收入版圖後，由於局勢已然穩固，攻克明鄭王朝的喜悅心情隨著時間消退。表面上，大多數的游宦文人都站在清帝國的角度，歌頌海疆拓土之大業，但部分官員「登臺觀海」之作已開始將海洋轉為個人際遇的寄託，這在康熙時期的游宦詩人的作品中也可零星看見。如林慶旺<sup>39</sup>〈澄臺觀海〉云：「形勝蔚崔巍，登高望九垓。三時先月得，<sup>40</sup>七寶避風催。<sup>41</sup>宦困穉顏骨，名成笑陸才。澄清惟此景，聳立素懷開。」<sup>42</sup>自慚官運不濟，身骨消瘦而似不禁風，趁此白日登臺觀海以遣己懷。又如孫元衡<sup>43</sup>〈澄臺〉詩云：「天光投白浪，山勢盡蒼煙。借問中原路，奔騰落日邊。」<sup>44</sup>登上澄臺向西方眺望海洋，對岸的高山遠在雲端，身處「異域」的詩人感嘆「中原」就在彼端，藉由海洋抒發其意欲返回中國大陸，帶有朝向政權中心晉升的企盼。至於張琮<sup>45</sup>的〈澄臺觀海〉，則藉海洋表達對君王的感戴：「海上層臺俯四隅，縱觀觀止百川輸。波光耀日連天有，蜃氣成樓到地無。潑眼昔曾吞夢澤，盪胸今更挹冰壺。微軀薄宦重洋隔，欲叩君恩仗吸呼。」<sup>46</sup>張琮來台擔任台灣縣丞，乃「從

39 林慶旺，福建晉江人。康熙34年（1695）任台灣府學教授。

40 「三時」之語，出自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相傳杭州人遊西湖，只在「午」、「未」、「申」三個時辰，然袁宏道認為夜月之景別是一番趣味。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處林慶旺則反用此典，認為海景以白日較佳。

41 「七寶避風」為漢成帝之典故，相傳漢成帝怕趙飛燕弱不經風，故興築「七寶避風臺」使其居其中。《漢成帝內傳》：「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蕩，帝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

42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頁215。

43 孫元衡（？～？），安徽桐城人。康熙44年（1705），遷台灣府海防同知。

44 同註42，頁288。

45 張琮，雲南河陽縣人。康熙48年（1709）調補台灣縣丞。

46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一）》，頁382。

九品」之微官，如今登上澄臺，藉觀海賦詩之機叩謝君恩，一方面或也寄寓對未來仕途「遇／不遇」的不安。

由此可見，當明鄭與清廷的對抗已成陳跡，<sup>47</sup> 臺海之局勢日趨穩固，在權力場域長期未有變動的情況下，游宦人士「登臺觀海」所聯想，開始偏重於自己在仕途上的「遇／不遇」之問題。無論是「遇」或「不遇」，這種將自身的宦海浮沉，藉「登臺觀海」之機加以表述的情況，在乾隆以後的官紳詩作中更為常見。例如舒輅，姓他塔喇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5年（1740）任巡台御史。其〈九日會澄臺即事〉一詩就說：

北去雲千疊，東來水幾盤。燕臺纔共署，鼉嶼又同官。波冷浮槎海，煙凝隱豹巒。文光臨睥睨，斗柄近闌干。菊澹詩情淨，萸馨酒量寬。登臺懷桂棹，煮茗羨江湍。鳳翥毛搏彩，龍驤血灑汗。彎弓不尚革，走筆自飛翰。飭己一誠格，齊民萬念攢。焚香讀周易，鴻漸喜于磐。<sup>48</sup>

此詩敘述他與僚屬在重陽節登上澄臺宴飲，及其對這些官員的期許。詩末「鴻漸喜于磐」之語，即出自《易經·漸卦》：「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無咎。」孔穎達正義說：「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後世用以比喻官位之升遷。此處以「磐」代「干」，除了保存了水濱崖岸之意來代指海上的台灣之外，更以其穩固的形象砥礪僚屬，只要修己至誠讓民眾感戴、海疆穩固，宦途自然通順，升官指日可待。話雖如此，詩人何以要「焚香讀周易」呢？其實也是對自身仕途「遇」或「不遇」充

47 如朱景英，湖南武陵人。乾隆34年（1769年）擔任台灣海防同知，乾隆39年（1774年）調任北路理番同知。其〈龔蕙晦宣副帥招同任伯卿將軍登赤嵌城望海作〉，即藉「登臺觀海」之機，用詠史之筆法，抒發滄海桑田之感嘆。其詩云：「積霞墮海海濛頂，牡土御天天淨滄。中流堅壁乃塗艘，四際浮舟勿凝汞。聞昔此城創荷蘭，氏以赤嵌雄當關。厥狀施熾出紺鬘，屹然百雉凌飛湍。婆娑洋外腥風扇，赧駁重垣閱爭戰。魚龍鬢鬢折且摧，甌脫如斯詫奇變。惟應望遠憑高邱，蠲鼉島沒馳碁浮。白波山立黑風斷，奔走百怪收雙眸。相於釣客任公子，乘興侵晨片帆指。況有賢主龔孟公，將攜直上條侯壘。初從舊洞循階梯，周遭步墨勞參稽。陶旋工鉅費不訾，齒冷積磬旋空甌。連芥要復羞觀縷，崑瑣曷足當懷古。偶爾恣眺窮交嶠，不覺高歌動謙櫓。人生遊涉會有期，之罘蓬碣信所之。樽桑指點此郭郭，誰令感喟銷欒髮。礮車矢弩青苔臥，殘堞斜陽影同破。承平番戍此間宜，畫角聲中起選懷。暮煙現滅西忽東，歸舟依舊乘長風。眼中突兀意觸忤，萬里波瀾莽迴互。」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三）》，（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02），頁28。

48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二）》，頁208。

滿了疑惑，故而希望以卜決疑。

在舒輅〈九日會澄臺即事〉一詩，或許只是藉著與僚屬「登臺觀海」的宴飲場合，抒發自己對仕途「遇」或「不遇」的感觸。然而，在往後「登臺觀海」之作中，海洋更進一步成為來台官員寄託自己仕途更加順遂的期盼，或是「不遇」之感的重要載體。如莊年，江蘇長洲人。乾隆6年（1741）任淡水廳同知，翌年陞福建建寧知府，翌年任分巡台灣道按察史司副使。其〈澄臺觀海〉一詩，即藉由海景感嘆公務之辛勞：

簿書筭束苦相纏，乘興登臺意豁然。煙靄光中三面水，晴雲影裏四垂天。瀟茫境界憑欄外，浩蕩滄溟落照前。極目波濤渺無際，笑他精衛若何填。<sup>49</sup>

詩作開端描述自己擺脫成堆的公文案牘，登上澄臺，想藉登臺觀海來舒緩工作的疲勞。憑欄向西面的海洋望去，天晴水闊，正值夕陽西下，更顯得海洋之浩瀚。詩末更讚嘆如此壯闊的海洋，是傳說中的精衛鳥所無法填平的。在此處，詩人實以精衛鳥自比，以此對應首句之案牘勞形，感嘆身在官府有無數的工作就像大海一樣，自己永遠無法填滿。當中就隱含著對於仕途「不遇」的無奈感，而寄託在海洋傳說之上。

這種對於仕途的「不遇」之感，不只透過海洋的神話傳說來表達，也藉由觀看海上活動的意象來呈現。如楊二酉（1705～？），山西太原人。乾隆4年（1739）擔任巡臺御史。其作〈登赤崁城〉一詩云：

極目天涯是水涯，荷蘭城上計程賒。潮光沸沸鳴奔馬，帆影星星點暮鴉。日麗九重天子闈，雲飛萬里使臣家。何時慰我桐花節，好向龍津一泛槎。<sup>50</sup>

詩人在赤崁城上看著海洋，一方面度量著海上航程的距離，看著逐漸遠離的船

49 同註48，頁217。

50 同註48，頁141。

帆，思念著遠方。天上太陽所照耀的地方是天子的宮闕，遠方雲彩飄浮之處是詩人的故鄉，「登臺觀海」所見之海洋，一方面寄託了鄉愁，一方面則寄寓了對帝國權力核心的想像。此情此景，讓詩人期盼自己也有有一天能乘船離去，在桐花時節航向對岸，向帝國的權力核心邁進。詩中表面上充滿了光明、希望的想像，但背後實有「不遇」之感，希望獲得君王更加恩遇，而有進一步的升遷。同樣的念頭也出現在張若靄的〈澄臺觀海次巡憲六公韻〉詩中。張若靄，安徽桐城人。乾隆11年（1746）7月調署台灣海防捕盜同知。翌年11月兼攝台灣知縣。其〈澄臺觀海次巡憲六公韻〉詩云：

聳立憑欄蕩遠眸，海天一碧望中收。鯨魚潛伏三千浪，鵬鳥高搏九萬秋。極目無情逢幻市，近山有意覓瓊樓。會當上獻安期棗，看取滄溟瑞色浮。<sup>51</sup>

詩題中的「巡憲六公」指的是滿巡台御史六十七。六十七，號居魯，滿州鑲紅旗人。乾隆9年（1744），以戶科給事中奉命巡視台灣。六十七亦有〈登澄臺觀海〉之詩，眺望海洋遙念神州，並讚嘆台灣海景之壯闊。<sup>52</sup>而張若靄此詩則以同樣之韻腳作詩唱和，當中更寄寓自己能更進一步升遷的念頭。登上澄臺觀海，將海上景致遍覽無遺。頷聯「鯨魚潛伏三千浪，鵬鳥高搏九萬秋」之語，乃運用《莊子·逍遙遊》「鯤」化為「鵬」之典故來比擬自己。雖然今日像鯨魚一般潛伏在海中之孤島台灣，但明日終會像大鵬鳥一般高飛，隱含自身希望平步青雲的意念。詩人無意追求海市蜃樓般的仙境，而將焦點集中在高臺底下的台灣。詩之尾聯運用安期生在上海仙山植棗如瓜之傳說，希望能向君王獻上仙果，讓整個海疆呈現祥瑞之氣。這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君王奉獻心力，另一方面也有希望進一步高昇的意圖。

這些來台官員並非落拓不遇，然而來到海疆的台灣，不僅位處帝國版圖

51 同註48，頁290。

52 其〈登澄臺觀海〉一詩云：「層臺爽氣豁雙眸，遠望滄溟萬頃收。赤霧脚將紅日暮，銀濤拍破碧雲秋。鯤鵬飛擊三千水，島嶼平堆十二樓。極目神州渺無際，東南形勝此間浮。」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二）》，頁248。

的邊陲，更讓這些官員想像自身處於帝國權力場域的邊陲。如前述的張若以「鯤」、「鵬」自比，來到台灣就像是鯨魚潛伏水中，希望有朝能像大鵬一般振翅高飛，更隱含了向帝國權力場域之中心遨翔的隱喻。因此，當他們站上澄臺，雖然位居台灣權力核心，卻也難掩他們身在帝國權力場域邊陲的事實。向西眺望海洋，就成為這些游宦文人嚮往帝國權力中心的展現。海洋，一方面阻隔了他們與帝國的密切聯繫，卻也是他們朝向帝國的唯一途徑，故而在「登臺觀海」詩作中，展現出「遇／不遇」的矛盾情結。這樣的矛盾情結，甚而可以讓同樣的「登臺觀海」詩作，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書寫面貌。這就可在覺羅四明兩度登上澄臺的詩作中發現。覺羅四明，滿洲正藍旗人。乾隆24年（1759）任台灣知府，乾隆26年（1761）任台灣道兼提督學政。其〈登澄臺遠眺〉一詩，藉由「登臺觀海」來抒發自己報國的志向。其詩云：

登臺披素抱，極目惕深衷。鹿耳雄關險，鯤身鐵鎖崇。湯湯洪浪渺，靄靄白雲濛。報國慚才菲，丹誠竭海東。<sup>53</sup>

詩中自近而遠的描述詩人所見之景象。登上澄臺，看到海濱鹿耳門、鯤身的堅固防禦，又看見壯闊的海洋、波濤洶湧。在海洋的彼端，白雲迷濛之處，其實隱含著詩人所嚮往的帝國權力中心，故而在尾聯表達自己願意為帝國盡忠的意念。觀看海洋，成為詩人祈求君王恩遇的行動。雖然如此，詩人也難掩自己身處帝國邊疆的寂寞。同樣是登上澄臺觀海，其〈澄臺觀海〉一詩就如此說：

駭浪吼聲度竹，高臺雨氣生寒。莫道天涯寂寞，憑欄是處奇觀。<sup>54</sup>

登上澄臺觀看海洋，所求不再是為了君王的恩遇，而是為了排遣自己在帝國權力場域邊緣的寂寞之情。「遇／不遇」，就成為此時詩人在「登臺觀海」時，思索的人生課題。

由是可知，在清領中期「登臺觀海」之作中，除了普遍以海洋來寄託詩

53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二）》，頁349。

54 同註53，頁351。

人身處「遇／不遇」之境，進而希望得到君王恩遇之情外，海洋也成為詩人在「不遇」的境地中抒解苦悶的對象。如前述覺羅四明之〈澄臺觀海〉即是，又例如余文儀的遭遇與其〈澄臺觀海〉一詩亦如是。余文儀（？～1782），浙江諸暨人。乾隆25年（1760）調任台灣知府，乾隆27年（1762）攝海防同知，乾隆29年（1764）陞台灣道，11月擢升福建按察使。復於乾隆33年（1768）「黃教事件」中來台督撫，後因疑似錯報功績而被革職留任。其〈澄臺觀海〉一作，似是描述此時之心境：

戟門西上聳澄臺，扶醉登臨亦壯哉。片片賈馮破浪出，騰騰陣馬御風來。守身時懷冰淵念，拯世深慚舟楫才。但使汪洋歸大度，任他蠡測與鷗猜。<sup>55</sup>

帶著酒意登上澄臺，海上商船的船帆在浪濤中隱約可見。騎兵騎著軍馬在岸邊奔馳，象徵當時經動亂仍維持緊張的態勢。但詩作的重心並不在此，而是詩的後半段。詩人描述自己為官，雖然不是拯救蒼生的良才，卻也無時不刻維持清白的官譽，似有意為自己被革職留任之事有所辯駁。然而，事已至此，詩人望著海面，惕勵自己要放寬胸懷，像海洋一般，讓官場中小人難以猜測。

綜合前面所述，在清領中期的「登臺觀海」詩作中，詩人不再藉由海洋表現對帝國拓土的歡欣，轉而關懷個人的遭遇。在「不遇」的感慨下，海洋成為來台游宦文人心靈上的寄託。對於這些官員來說，海洋的另一端是故鄉，但也是朝向帝國權力中心的道路。正如胡承珙〈澄臺晚眺〉一詩中所說：

寂歷斜陽上麗譙，微茫一線鹿門招。<sup>56</sup>小園種樹剛春雨，暇日登樓又晚潮。公子風標看白鷺，美人名字記紅蕉。天涯滋味蠻鄉景，賴有詩情耐可銷。<sup>57</sup>

胡承珙（1776～1832），安徽涇縣人。嘉慶10年（1805）進士，道光元年

55 同註53，頁365。

56 原詩有註：「鹿耳門外暗砂甚多，舟人插標以識，謂之『招』，有『南招』、『北招』。」

57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四）》（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02），頁20。

(1821) 調補台灣兵備道。登上澄臺觀看海上夕陽景象，為的是排遣在「天涯」邊疆的寂寞，為有藉著寫詩來消愁。不同於前代詩人將來台視為帝國拓土的一部份，內心充滿積極奮發的「澄清」之志，清領中期的游宦文人已無這樣的情懷，而對於身處邊疆感到相當無奈。此時海洋的浪濤波動，就成為游宦文人比擬自己在宦海浮沉的對象，或是企盼到達對岸的途徑。

#### 四、四海鼎沸：清領後期時局動盪之投射

當清帝國之勢力穩固時，周遭無強大之外敵，權力場域的結構相對平穩。而台灣或民變頻繁，但多隨即遭清廷調兵弭平，未對權力場域造成太大的影響。因此從乾嘉時期「登臺觀海」之詩作中，所關注者，多為自身仕途順遂與否的感懷。然而，當清帝國勢力衰退，局勢日益動盪時，官紳眼中的海洋是否仍聚交在自身的仕宦之途上呢？當權力場域有所變動，位居台灣權力核心的官紳應較一般平民百姓更為瞭解實情。清領後期，不只在台灣，在中國大陸也有多次重大的民變，<sup>58</sup> 帝國威權鬆動的徵兆已然顯現。再加上來自海洋，西方列強的入侵，更是使得國勢日益險惡。府城官紳對於情勢的轉變，自然不可能一無所悉。特別是西方列強多由海路入侵，而台灣更四面環海，府城亦在濱海之地。故而府城官紳「登臺觀海」所見之海洋，就不同於前代詩作之海洋，產生與眾不同的時代意義。

在台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之作中，姚瑩〈己亥五月十日病起登澄臺憶濟光內渡〉之作，就顯現了清帝國勢力衰退的徵兆。海洋，也不再負載詩人個人對仕途的「遇／不遇」，轉而在書寫中與家國面臨威脅的不安相結合。姚瑩（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24年（1819）調任台灣知縣，旋兼理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移署噶瑪蘭通判。其後宦海波折，至道光18年（1838）始擢台灣道。他在道光19年（1839）所寫的〈己亥五月十日病起登澄臺憶濟光內渡〉詩中就寫到：

58 如太平天國、捻亂等反清事件。

高臺登眺廢經旬，徙倚危欄白髮新。海上風雲時變色，天邊雷雨憶歸人。鯨鯢夜靜珠宮冷，鏡鼓朝喧貝闕振。更喜嘉禾遍收穫，不嫌布穀後三春。<sup>59</sup>

在詩中，姚瑩自註：「南北兩路數亂，民間祭賽多罷。今爭補之，喧闐千里。」何以如此？考察當時民變之狀況，道光12年（1832）嘉義發生「張丙事件」，翌年在彰化、淡水發生閩粵械鬥，隨後嘉義又有「許戇成事件」，道光16年（1836）在台灣縣、嘉義縣又有「沈知事件」、「鍾阿三、鄒戇狗事件」。就連姚瑩始任台灣道的道光18年（1838）也分別在南路的鳳山發生「張貢事件」，北路的大武壠（今臺南縣善化鎮）、店仔口（今台南縣白河鎮）分別有「胡布事件」、「游撻生事件」。<sup>60</sup>對於清廷來說，台灣自來就是難治之地，如此頻繁的民變，不只是臺灣民眾表達對官員的不滿，更代表清廷統治勢力的衰退。故而姚瑩登上道署的「澄臺」觀海賦詩，所見、所述之景象即與前代不同。詩中描述，登上「澄臺」遠眺，回想上次登臨已經許多時日。何以如此？應是致力於處理南北兩路之民變。且由於事務繁重，頭上新長出許多白髮。倚著欄杆望海，海面上風急雲走，隱隱傳來雷雨的聲響，正象徵詩人對時局動盪的憂心，並寄託對親友的思念。值得慶幸的是，今夜凶猛的海中巨獸銷聲匿跡，讓龍宮略顯冷清，取而代之的是喧囂的慶典。這正是形容詩人身處「澄臺」望海所感，將「珠宮」、「貝闕」比擬為海中的台灣，而「鯨鯢」象徵近年發生的多起民變，如今回歸正常，民眾補辦慶典。更高興聽聞稻穀豐收的消息，完全不受民變而延遲播種的影響。

對於姚瑩來說，登臺望海一方面是遙念遠方的親友，另一方面藉由海洋的場景觸發的對時局動盪的感觸。詩人「登臺觀海」所關注的不再是個人的宦海浮沉，而是透過海洋的場景及神話傳說，投射內心從不安到歡欣的情緒轉折。而且由於清帝國的勢力更加衰弱，使得「登臺觀海」的書寫產生新的面

59 同註57，頁80。

60 劉妮玲，〈清代民變研究〉（台北：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3），頁110-118。翁仕杰，《臺灣民變的轉型》（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4.08），頁50。

貌，「海洋」成為威脅的來源，這也反應在詩作中。如劉家謀的〈赤嵌〉詩中即是如此。劉家謀（1814～1853）字仲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道光29年（1849）調台灣府學任訓導。咸豐3年（1853）廈門小刀會起事，餘眾黃位擾亂澎湖海面，鳳山林恭與之相呼應，攻陷鳳山縣治，並進一步企圖包圍府城。<sup>61</sup>當時劉家謀承擔防禦工作，因操勞而病卒。<sup>62</sup>其〈赤嵌〉四首之四即為當時的作品，藉由「登臺觀海」所見之景象，表達對來自海洋的威脅感到憂心。其詩云：

中外年來可一家，紅毛城上罷鳴笳。火輪誰使移新艦，鐵板翻令失舊沙。尚有郊原竄狐兔，易教島嶼引蛟蛇。董宣搏擊尋常事，已聽神君滿縣誇。<sup>63</sup>

詩中所述的海洋景象，正顯現當時清帝國面臨內外迫的情況。自中英鴉片戰爭，清廷於道光22年（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後，一百多年的閉關自守也開始鬆動，西方商旅也開始在中國沿岸尋找貿易口岸。在咸豐元年（1850），就有西方的輪船抵達台灣貿易的紀錄。<sup>64</sup>劉家謀〈赤嵌〉詩作中就以「中外年來可一家」，帶有嘲諷意味的陳述清廷迫於列強壓力讓商船停泊互市的情況。詩人登上「紅毛城」，卻發現此地早已撤除了防備。<sup>65</sup>舉目所見，

61 唐堦〈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云：「先是，粵西賊洪秀全作亂，假勝國後裔，稱天德王，欲傾煽海內，我閩漳、廈之小刀會應之。臺人素浮動，自隸版圖，豎旗叛者屢矣。聞廈門陷，群不逞徒蠢蠢焉。私計曰：今後天戈不遑東指，我輩其可得志乎！賊魁林恭，初充鳳山縣壯勇，王邑侯廷幹汰之，遂懷憤。至是，與北路賊張古、羅阿沙、賴棕等密謀起事。顧縣城防守嚴，林恭乃偽為義民，出不意破竹圍入，戕王邑侯全家。……林恭又於五月初二等日眾攻郡，郡之人擊走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壬部·藝文（一）〉（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413-414。

62 《福建通志列傳選·劉家謀》：「海寇黃位倡亂，臺匪應之；家謀時已病肺，力疾守陴。積三閱月，以勞卒，年四十。事聞，恤其子為國子監生，時咸豐三年也。」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362。

63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五）〉（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02），頁335。

64 連橫《臺灣通史·經營紀》載：「咸豐元年春三月，……西洋輪船始來滬尾、雞籠互市，照例納稅。」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82。

65 「笳」原為胡人的吹奏樂器，後用於軍中充當軍號。此詩以「罷鳴笳」代指撤除守軍。

海面航行著西方商旅的蒸汽輪船，早年象徵府城堅強防衛的「鐵板沙」，<sup>66</sup>於今在新式輪船的進逼下也喪失其意義。此詩的前半段描述當時西方列強入侵的情況，後半段則敘述清帝國內部的民變對台灣的影響。咸豐3年（1853）4月，小刀會黃位作亂，率眾入廈門城，曾一度佔據提督衙署，後逃竄澎湖洋面。而當時台灣則有鳳山縣的林恭、噶瑪蘭吳磋與之南北呼應，舉兵反抗清廷。劉家謀當時正擔任防衛部隊的一員，防禦林恭對府城的攻擊。所以詩中「尚有郊原竄狐兔，易教島嶼引蛟蛇」之語，就是形容臺灣島內部的動亂，同時也容易引來海上蛟蛇惡獸侵擾臺灣。因此，無論是西方列強或是小刀會起事，海洋對於劉家謀來說，都是一個威脅的來源。這也是清帝國勢力日蹙下，官員「登臺觀海」對於海洋書寫的新變。而劉家謀面對這種局勢，以東漢初年著名的「強項令」董宣自詡。期盼自己能像他一樣懲奸除惡，受君王褒揚。

然而，從海洋來的威脅卻日益增加。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開始侵略中國本土。咸豐6年至10年間（1856-1860），清廷與英、法兩國兩度交戰，戰場擴及廣州、天津、北京等地。咸豐10年（1860）10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焚燬圓明園，迫使清廷除了完成「天津條約」的換約外，更進一步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英、法之所以能開闢戰場於千里之外，侵擾中國沿岸多處，即仗勢著當時先進的海軍艦艇。除以砲艇轟擊岸上防禦設施之外，更可快速調動軍隊登陸作戰，在在凸顯「制海權」的重要。缺乏「制海權」的清廷，終究只能在陸上迎敵，而海洋就成為敵對的一方，充滿了威脅。這種海陸對抗的態勢也反映在台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的詩作中，時於府城擔任幕賓的李逢時，其〈澄臺觀濤〉就是如此。李逢時（1829~1876），字泰階，宜蘭人。咸豐11年（1861）辛酉科拔貢，同治元年（1862）應台灣道兼學政孔昭慈之聘為幕賓，或於當時寫下了〈澄臺觀濤〉一作：

蜃雲吹散雨初晴，赤嵌孤懸海外城。怪底大聲來水上，暮濤終古作雷

66 清領初期，「鐵板沙」有府城屏障的象徵。如郁永河〈臺灣竹枝詞〉其一即云：「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作者有註：「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崗也。鐵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鳴。<sup>67</sup>

此詩藉景抒情，表面上將其登上澄臺所見所聞直筆述出，然此景卻也隱喻對海上威脅的憂心。過去清帝國強盛的榮景就像海市蜃樓般，被海上的強風吹散。與英、法兩國的戰爭在簽訂條約後，取得短暫的和平，就像雨後初晴一般。登臨澄臺眺望海濱，看見當年由荷蘭人興建的「赤崁城」（應指「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讓詩人醒悟，其實台灣自古以來就面臨著海上西方列強的威脅，故而有「怪底大聲來水上，暮濤終古作雷鳴」的感嘆。

故而當西方列強逐步進逼，位於海洋之中的台灣自是難以倖免地受到侵擾。在清領後期，台灣亦曾多次遭到外國軍隊的侵襲，其中包括因羅妹（Rover）號事件而引起美軍企圖攻擊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同治6年（1867）3月，美國籍商船羅妹（Rover）號在台灣南端觸礁沉沒，生還者遭當地原住民攻擊，引發美方向清廷抗議。閩浙總督嚴桂令台灣道、鎮處理此事，與美方廈門領事李讓禮（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交涉。美方不滿清廷官員的消極處理，遂率軍艦企圖攻擊原住民部落。<sup>68</sup> 時任台灣道的吳大廷與台灣總兵劉明燈憂心事態擴大，遂與李讓禮及原住民面議和約，解決此一爭端。<sup>69</sup> 吳大廷（1824~？），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同治5年（1866）10月移調台灣兵備道。同治6年（1868）2月卸任離台。其〈澄臺觀海〉一詩，或是他在即將離任前的感懷：

67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九）》（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8.04），頁91。

68 《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邦交志》所言：「（同治）六年，美『羅妹』商船至臺灣之瑯瑯洋面遭風船破，被生番戕害——又有美商『羅發』遭風飄至臺灣極南海島，亦被害；至是，美住廈門領事李讓禮欲坐兵船赴臺住泊。八月，到瑯瑯，會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究詰此案，而龜仔角生番糾集十七番社謀抗拒。劉明燈招番目卓杞篤往諭。始知五十年前龜仔角一社之番悉被洋人殺害，僅存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挾仇圖報。因諭番人解散，勸李讓禮無深究，免再結仇，李讓禮許諾，遂議結。」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96。

69 據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記載：「六年合眾國商船遇礁撞破，船主羅妹及其眾上岸逃生，生番殺之，並掠其餘貨。該國領事李讓禮懇臺灣鎮、道，求辦生番，以儆將來。意在收斂殘屍、救回活夷；求中國收其地設兵管守，永杜番害，未嘗別有要挾也。臺灣鎮劉明燈、臺灣道吳大廷鑒其無他，即與定議。又令生番曉事頭人卓杞篤與李讓禮商議善後諸事，李讓禮遂與生番連和。」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99-100。

百年遺構此澄臺，取次登臨倦眼開。海色遠隨朝日霽，濤聲高壓晚潮回。揚舲何日騎鯤去，攬勝曾經戲馬來。永念烽煙清島嶼，艱難慚負濟川才。<sup>70</sup>

此詩前二聯，實有「古／今」對照之用意。首聯出句回想百年前澄臺之設，對句則敘述今日登臨澄臺之事，以今昔之對照來強調澄臺之歷史感。而頷聯同樣採「古／今」對照，象徵帝國威勢已不復從前。過去的海洋就像照映著清晨的陽光般燦爛，正象徵著帝國如旭日般蒸蒸日上。如今，帝國威勢逐漸走下坡，來自海洋的威脅就像晚潮的聲響般撲來。此處更是象徵對於美方企圖藉由羅妹（Rover）號事件揮軍攻台，引發詩人對海上西方列強之威脅所產生的喟嘆。此詩後半「揚舲何日騎鯤去」敘述當時詩人正要卸任離開台灣，似說明此次「登臺望海」登臨澄臺，正是與同僚餞別。詩中之「戲馬」之語，為「戲馬臺」之典故。如《宋書·孔季恭列傳》言：「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昭明文選》卷二十賦壬亦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可以為證。因此，「攬勝曾經戲馬來」之句，即說明此次「登臺觀海」實為餞別。在臨別之前，詩人所掛念的，還是希望台灣這座島嶼可以永遠不受戰火的侵擾。而詩末「濟川」之語，乃取自《舊唐書·馬燧傳》：「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sup>71</sup> 似述自己因病乞求開缺離台，<sup>72</sup> 著實愧對與他一同經歷危難的人們。

由上述的例子可見，清領後期府城地區官紳「登臺觀海」書寫中的海洋，其威脅性日益增加，正顯現清帝國受西方列強侵擾下，帝國知識份子對情勢轉變的憂心。不只是來台的游宦官員或任職府城的外地士紳，府城本地的士紳也逐漸認知西方列強所帶來的威脅。在施士洁〈登赤嵌樓望安平口〉詩作

70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八）》（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頁542。

71 《舊唐書》（四庫全書270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584。

72 據《清穆宗實錄選輯》記載，吳大廷因病內渡。書中記載：「（同治七年）八月乙巳朔，諭軍機大臣等：『臺灣地方關繫最為緊要，道員吳大廷前因患病內渡，經沈葆楨留於船政局差委；即著英桂等飭令迅回本任，以重職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穆宗實錄選輯》，（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115。

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施士洁（1856-1922），字灑舫，號芸況，府城人。光緒3年（1877）進士，授內閣中書，後返台任教彰化白沙書院、台南崇文、道學、海東書院等地。台灣兵備道唐景崧仰慕其才，時以詩文相交。其〈登赤嵌樓望安平口〉三首其一，藉由登臺觀海，兼及西方列強所帶來的衝擊。其詩云：

一度登臨一惘然，紅毛遺跡渺蒼煙。兩三點鳥層霄外，十萬人家落照邊。隱約市聲當暮沸，微茫山影抱城圓。我來正值涼風起，鼓角防秋又幾年。<sup>73</sup>

詩人登上赤嵌樓向西邊的安平眺望，遠方的「紅毛城」遺跡隱沒在煙霧之中。安平地區除了有繁榮的街景外，從「微茫山影抱城圓」之語可知，遠方隱約還可見到城池。這座城池應是指鯤鯓海口上的新式砲臺「億載金城」。「億載金城」為沈葆楨在同治13年（1874）所建，光緒2年（1876）完工，目的是為鞏固安平海防。<sup>74</sup>而施士洁看見新建的砲臺，又想起正值秋季，恰是古人「防秋」之時。唐中葉以後，由於突厥、吐蕃等邊疆民族常於秋日進犯，故增兵固守邊疆，號曰「防秋」。施士洁看見新式砲臺又聯想起「防秋」之典故，其關鍵就在抵抗外夷的意象上。而沈葆楨之所以興建「億載金城」，其近因亦是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以及日本進攻牡丹社的事件。

由此可見，從清領末期府城地區「登臺觀海」的作品中可以發現，由於清帝國勢力的衰退與西方列強的入侵，海洋成為官紳們時代變局之憂心而帶有威脅的象徵。這種情況更是充分表現在唐贊袞的諸多詩作中。唐贊袞，字韡之，湖南善化人。光緒17年（1891），調署台澎道兼按察使，後補台南知府。而當時由於海上的威脅日益嚴重，唐贊袞因職責所需，故經常校閱濱海防

73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十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頁63。

74 《臺灣通志·資料（一）·安平新舊砲臺軍裝局火藥局電報局鎮海正左營事略》云：「安平大砲臺：臺建於郡小西門外之三鯤身地方，西臨大海，控扼形勝。同治十三年，日本窺臺，辦理海防欽差大臣沈公葆楨，以臺南郡城為根本重地。鹿耳門雖稱天險，尤必有洋式砲臺安置大砲數尊，方足以洞穿鐵甲敵船，而固金湯。爰即奏建，擇是年九月興工，至光緒二年八月告竣。……又建城門洞一處，榜曰：『億載金城』。」蔣師轍，《臺灣通志（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728。

務，因此有了與眾不同的「登臺觀海」書寫。如其〈臺道總理臺南營務處防營陸營時須校閱別旗色以立號齊金鼓以施令余於軍旅之事固未嘗學也郝顏登壇亦猶持布鼓過雷門耳〉詩中就說：「方今海上多囂氛，臺疆屏蔽幾萬里。訓練隨時布鶴鵝，安得猛士堅壁壘。」<sup>75</sup>此詩或未登覽海洋，只是藉由校閱之機，一抒對海洋帶來危機的感嘆。然唐贊袞另一首詩作〈冬日親赴砲臺再校廿八尊鋼砲〉，藉由校閱之機登覽海洋，更進一步的展現其想像：

鋼砲製自佛郎機，英咭喇砲乃過之。我于年冬閱軍壘，沙墩石壁如布碁。長鯨鼓浪雷電鬥，銜尾再遁催鱗鬣。莫笑黃金擲虛牝，堪以利器雄島夷。<sup>76</sup>

此詩之「砲臺」，應是前述的「億載金城」，為了守衛安平港出入口而興建。唐贊袞藉校閱之機，「登臺觀海」而寫下此詩。詩中的海洋，同樣是充滿危機的象徵。詩人想像，海中龐大的鯨魚象徵著西方列強，不斷鼓動浪潮拍擊陸地，而砲臺的興建正可與之抗衡，使其銜尾遁逃。詩中首句「鋼砲製自佛郎機，英咭喇砲乃過之」之語，除直述大砲之發展，或隱含了「以夷制夷」的意圖，希望以西方引進的新式鋼砲來抵禦西方列強的入侵。若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就算花再多的錢財來興建砲臺也值得。唐贊袞在另一首〈安平口自春徂秋湧聲震摺其地即鯤身也〉詩中，更是清楚表達這種心情：

老鯤復作惡，噴浪相陵虐。願張錢王弩，一射狂濤落。<sup>77</sup>

詩中同樣藉景抒情以海中巨鯨比擬西方列強，無端製造浪潮侵陵領土，而詩人希望藉由增加武備加以抵擋。詩末引用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錢王錢鏐（852~932）率弓兵射退浪潮的傳說，希望自己也能向錢王一般，擊退外敵。

綜觀整個清領後期府城官紳「登臺觀海」的詩作，正如同蕭瓊瑞在《懷

75 同註73，頁607。

76 同註73，頁608。

77 同註73，頁647。

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裡，所論述清領後期的八景圖，如彰化八景圖或蘭陽八景圖當中，不斷出現軍事設施的情況。其論述說：

道光之後的台灣八景圖，一如帝國正在一路走下坡的國勢，即使不談繪作的技巧或風格，內涵上已經缺乏初期那種大開大闔的氣勢與豪情，……顯示這個發展中的帝國，已經沒有了初臨臺灣時，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向無敵的浩大氣勢。<sup>78</sup>

與「八景圖」的情況相似，清領後期「登臺觀海」之作，已經沒有最初攻取台灣之後，欲施展「澄清」之志的豪氣。海洋，成為一個壓力來源，威脅著清帝國的權力場域。這自然也影響到在權力場域中的府城官紳，因此藉由「登臺觀海」之機，抒發自己對於列強入侵的感慨。

## 五、結語

綜合前面所述，清代官紳「登臺觀海」之書寫，或以展現登覽行為之特殊，或以表達對民生的關懷與盛世之歌頌，或以描述時局動盪的憂慮，皆與權力場域的更替息息相關，這也讓書寫中的台江海域呈現出豐富的意義。詩人登臺所「見」者雖是海景，但在詩中卻也展現出他們關注的「不見」之域。

清領前期，登臺觀海多敘述描述繁榮景象者，或藉由登臺遠眺，突顯清廷之功業，此乃接近台灣權力核心的官紳常見之立場。當是時台灣初定，對清廷而言，乃是完成天下一統的壯舉，朝廷上下都瀟灑者歡欣、奮發之氣氛。來台官員「登臺觀海」之作中，海洋的澄澈成為他們一展「澄清」之志的象徵，希望能讓台灣這塊新開拓的海疆得以和平安樂。府城官紳感受權力場域的氛圍，藉登臺之機，描述四周海面、港市之興盛，讚頌盛世界平，意在突顯當權者之治術，藉機表達自身對權力核心的信任與效忠。

然而當局勢穩固，戰勝明鄭、統一天下的欣喜隨著時間消退，詩人也開始關注個人的仕途。海洋，成為個人在宦海中浮沉的寄託。「登臺觀海」，一

78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頁271-272。

方面感嘆海洋造成他們與帝國權力中心的阻隔，產生位居權力場域邊陲之感；另一方面海洋卻也是他們朝向帝國權力中心的唯一途徑。因此清領中期「登臺觀海」詩作中的海洋，就夾雜了「遇／不遇」的複雜情感。

而清領後期內亂、外患頻傳，台灣自不能置身事外，雖然列強之侵擾發生在基隆（中法戰爭）與屏東（牡丹社事件），但在當時局勢不明的情況下，濱海的府城自是嚴陣以待。身處權力核心的府城官紳，對此一局勢的發展自是有相當的瞭解。此時官紳登高遠眺的台江近海就充滿了威脅，而「登臺觀海」書寫中也屢屢浮現危機的隱喻。

因此，清代官紳對於台江近海之描述，並非單純書寫海洋之自然樣貌，當中更有相當複雜的人文社會之隱喻。尤以登臺觀海之作，因其與權力核心有所連結，雖然描寫的海洋面向不盡相同，或懷古、或歌頌、或焦慮、或愁思，但其書寫之根源皆來自權力場域的影響。這也使得近兩百年來的台江海面，呈現出豐富的人文意義。



## 參考資料

### 一、文獻

-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台北：大通書局，1987）
-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1-12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
- 宋永清，《增修臺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
- 金鉉、鄭開極，《福建通志臺灣府》（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高拱乾，《臺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
-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大通書局，1987）
-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台北：大通書局，1987）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台北：大通書局，1987）
-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清穆宗實錄選輯》（台北：大通書局，1987）
-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蔣師轍，《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台北：大通書局，1987）

### 二、專書

-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當代自然書寫的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11）
-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1）
- 翁仕杰，《臺灣民變的轉型》（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4.08）
-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08）
-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04）
-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06.06）
- 陳大為、鍾怡雯主編，《20世紀臺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09）

### 三、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 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台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國文學報》5期（2006.12），頁35-55。
-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5期（2008.06），頁1-15。
- 陳思穎，〈來自大海的呼喚——論清初巡臺御史錢琦詩作中的海洋書寫〉《國文學報》6期（2007.06），頁211-242。
- 陳憐汎，〈清代方志對澎湖景觀的書寫——以傳統漢詩為研究對象〉（上、中、下），《碇碇石》55、56、57期（2009.06、09、12）
-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03），頁41-71。
- 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臺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37卷2期（2007.12），頁491-533。

#### (二) 學位論文

-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到清朝時期〉（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5）
-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
- 劉妮玲，〈清代民變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3）
-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8）

#### (三) 研討會論文

-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人對海洋的審美感知與空間體驗〉，「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2009.10.24）。
- 李知灝，〈蛟鯨宮闕龍伯國：清代游宦文人渡臺書寫中的海洋想像〉「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2009.10.24）。
- 陳家煌，〈康熙時期台灣詩中的海洋感受——以《赤嵌集》為討論中心〉「多重視野

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2009.10.24）。  
陳啟佑，〈臺灣海洋詩初探〉，《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1999.09）

#### 四、電子媒體

陳佳妉，〈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來源：<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t/tan-ka-bun/pak-keng-si.htm>，2000.08.25上網）

